

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

付晓东^①

(大庆师范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要: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博大精深, 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特别注意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并被赋予了时代特征,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 研究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 对于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德治理论; 传统文化; 渊源

作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伟人, 邓小平德治思想以“务实”、“管用”为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德治思想不是用各种特定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建构起来的逻辑化的抽象理论, 而是在深悟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础上, 娴熟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道德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 从而形成的总体战略构想。

历史的发展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秀的文化, 中国特色的德治理论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曾指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当割断历史。”^{[1] 534} 对待传统文化, 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分析, 分清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 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博大精深, 邓小平特别注意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传统的德治思想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并被赋予了时代特征,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 研究邓小平德治理论的传统文化渊源, 对于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邓小平的集体主义观

义、利关系, 公、私关系, 说到底所反映的都是群体与个体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伦理道德的根本问题。在中国传统道德中, 情况更是如此。二程曾说: “天下之事, 惟义利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朱熹说: “义利之说, 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延平李先生书》) 陆九渊也说: “凡欲为学, 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陆九渊集·语录下》) 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家们是何等注重这一问题。那么他们是怎样认识这一问题的呢? 孔子曾明确指出: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 要求人们, 要“见利思义”, “见得思义”, “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孟子在与梁惠王谈话时也曾明确指出: “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并强调, 当“生”与“义”不可得兼时, 要“舍生而取义”。汉代董仲舒也强调,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注重“义”, 注重“公”的思想,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与“义利之辨”密切联系, 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发展史上, 还长期存在着“理欲之辨”。“理”是从理性出发, 对个体所提出的道德要求; “欲”则是个体对客观实际利益的欲求。一般说来, 先秦儒家看到“欲”会给人们带来危害, 但对“欲”存在的必然性、正当性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曾说: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论语·里

① 收稿日期: 2008-04-21

作者简介: 付晓东, 女, 黑龙江大庆市人, 大庆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与研究。

仁》)对于“欲富”、“欲贵”本身,孔子并不否定,他所“不处”的是使用不合乎“道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孔子所强调的是“欲而不贪”。并把它作为从政者应具备的“五美”之一。这与他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所强调的“义然后取”是一致的。孟子指出,“生”与“义”都是“我所欲”的。他强调的只是在“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才去“舍生取义者也”。荀子说:“欲者,情之应也。”并指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强调对于欲望的追求,应当加以节制。与先秦儒家相比,先秦道家则更多地强调了“欲”的危害。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因此他强调“少私寡欲”。理学家们强调“理”与“欲”即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即完全服从群体的利益,放弃个体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个体的压抑。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批判。他们主张的是“不去仁而成名”,“使人欲悉化为天理”(《陈确集·别集》卷二《近言集》)。即追求个体利益不能违背、损害群体利益,要使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统一起来,将个体利益融入群体利益之中。很显然,在他们的思想中群体仍然高于、重于个体。

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上,辩证地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精华,他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义利观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从一般意义上肯定并继承了其把谋求国家、民族、社会、公共、整体的利益的行为规定为义。强调既承认和肯定“义”的存在,又承认和肯定“利”的存在。邓小平曾经批判那种否认个人利益即“利”的片面性做法,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146}他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他说:“我们历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牺牲自己的利益。”^{[2]146}他针对那些否认集体利益即“义”的片面性做法进行了批判,强调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2]337}他坚决主张要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把追求崇高理想与满足个人物质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邓小平的集体主义观正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优秀成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和动力之源。

二 传统文化中的官德与邓小平的官德观

官德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魂,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官德教育。

一是强调“选贤任能”,突出“为政在人”。孔子认为,行政管理的优劣,关键在于能否“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要达到政通人和,民心所归,就一定要把那些正直的仁人贤者选拔上来。他有感于“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泰伯》)和“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宪问》)的史实,反复申明“为政在人”、“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

在人才的识别方法上,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常常可以反映出其秉性、知识和思想水准,正如子贡所云:“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所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孔子认为“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提出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举直错诸枉”、“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的识别人才方法。先儒还把那些是非不明、言行不一、巧言令色之人称为“鄙夫”(《阳货》),认为贤人能经受得住社会的磨炼:“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在人才的选拔原则上,主张“举贤才”。先儒们主张选拔贤才一是应不分贵贱:“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二是不论地位,孔子在答齐景公“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的问题时,指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爵之大夫,起縵绁中,与语三月,授之以政。”(《史记·孔子世家》)三是不论亲疏,主张选贤要广开才路,“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四是不咎既往,不计较“小过”,“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五是在用人上,切其所用,扬长避短,“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并通过试用而量才使用:“我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可誉者,必有所试矣。”(《卫灵公》)选贤是从政者的重要职能,“举才为智”。

二是强调“正人先正己”,提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为官者自身端正,不发号令百姓也会行使正道;为官者自身不端正,即使多发号令百姓也不会听。“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可见领导者的行为是治国的关键。为官者要规范好自己的行为,孔子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正己。孔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意思是说对老百姓要容貌端庄,那老百姓就会敬重你;要孝敬父母慈爱大众,那样老百姓就会忠于你;要是提拔好人教育不能为善的人,那老百姓就会彼此劝勉了。一句话,就是一切要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做好人君的表率作用。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总之,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在位者端正自己的品行,在于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只要自己带头做在前面,那么老百姓就会和你同甘共苦,付出劳力也心甘情愿。

尽职。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为官者要忠于职守,精勤不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意思是为官的要带头崇尚礼仪,遵纪守法,弘扬精神文明。孔子认为每个人都应在自己岗位上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尽职尽责,把事情做得出类拔萃,让国家满意,让群众放心,这就是政事,天下第一重要的政事。

邓小平同样要求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为人民群众做出表率。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必须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培养和锻炼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具体阐述了干部道德的基本规范。他吸取了古今中外反对贪污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干部道德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要求建立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干部道德规范。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它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道德规范和要求。1997年3月,党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主张从严治政,一个“良好的政府”是一个有着清廉的官员、严明的法纪、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的政府。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德治

国”,就必须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使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廉洁奉公、依法行政、公正公开、高效务实、不计名利。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政治伦理建设。

邓小平还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在培养“四有”新人的过程中,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这是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77}党的领导干部只有成为“四有”的模范,才能带动群众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说,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邓小平把选拔和使用人才当作百年大计来思考 and 对待,他强调干部使用上的德才兼备的标准,并赋予“德”以新的内涵。他强调德才兼备用人标准中的“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2]326}邓小平指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215}他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于领导。领导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行为风范,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与邓小平的“四有”新人观

传统德治思想比较注重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化对于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品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认为在百姓富庶之后就必须实施教化,“冉有曰:‘既庶矣,又何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孔子的思想就是最终要让老百姓受教育。孔子是最早提出修养并对如何修养进行深刻论述的人,特别是他提出的“修己”思想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借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篇》)这句话表面意思是工匠做事前要利其器。深究其意可知,这个“器”,并非像木匠、裁缝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器”,而是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学业之器。“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篇》)意思是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好恶分明,爱憎分明,才能敢作敢为,坚持原则。可见孔子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如何提高自身修养,

可从以下着手。

重学。学习是修身的基础,不学习就不懂得规矩,不学习就不懂得善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出仕做官的人,要是有余力就应该学习知识,这样可以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儒家对“学”的意思是广泛而深刻的,认为学习知识不仅仅是解决“不惑”的问题,学习知识包括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学习要达到心灵境界的升华,要达到“不逾矩”的境界。“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篇》)可见不学习,仁、智、勇、直、刚等修养就会产生弊端。

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这里孔子妙用比喻,勉励人们确立志向,然后通过努力,以抵于成,即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论语·子路篇》)人要是没有恒心,就像占卜治病的技能也掌握不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一事之成,除信心之外,立志、恒心是必不可少的。要提高修养也必须立志,立廉洁奉公之志,立先民后己之志,立为民造福之志,立为国鞠躬尽瘁之志,通过立志激励自己,告诫自己,提升自己的修养。

力行。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篇》)孔子教导学子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篇》)同时,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力行,“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篇》),只有“行”才能使“道”变为现实。“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语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孔子言行一致,甚至先行后言的修养思想,即“力行”的修养思想。

邓小平同样重视教化对公民的重要意义。现在改革开放,藏富于民,要让改革开放充满后劲,让天下社会太平安定,我们就必须把教育当头等大事来抓,他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28}“四有”是对公民素质的综合的整体性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人的问

题是贯穿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现代化只有最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才不会损害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3]111}如何提高国民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88}因此,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是要不断改进和提高国民素质,使之能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能灵活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趋势。既要注意先进分子的塑造和塑造先进分子,更要致力于社会大众、普通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只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成为“四有”新人,我们社会才能获得持续、稳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底蕴就在于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110}他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2]367}

邓小平“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丰富、系统而深刻的,构成了一个以人民利益本位价值观为灵魂,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和任务,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及个人完善,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邓小平一生酷爱中国古代典籍,这些典籍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人处世、革命品格、执政作风和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王友良)